

龍門石窟交通遺跡與佛教藝術的歷史聯繫

張乃翥

龍門石窟研究所

張成渝

北京大學地質系

張成岱

中國地質大學

提要：龍門石窟所在的伊闕峽谷，自三代以來即是中原王朝通往江漢流域的地理門戶。自太和十二年（四八八）前後北魏土庶在伊闕峽谷中鑄刊佛教造像之日起，數量可觀的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又為我們研究中古以降的中原人文社會留下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文化資料。在這數以千計的石刻文獻中，涉及中古時代洛陽歷史交通的文物資料在在多有，從而為我們瞭解當時的洛陽交通環境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歷史信息。本文通過對上述洞窟文獻資料的採擷編譯，著重從歷史地理學角度揭示了洛陽地區——尤其是伊闕峽谷中——那些令人魂魄震撼的交通往事，作者以歷史眼光關注這一地理問題的目地，是想通過對洛陽地區古代交通環境的解析，闡明其與古代文化藝術相與推挽、共臻繁博的歷史辯證法則。作者認為，這一歷史辯證法則的確認，對研究世界範圍內文化遺產的群落成因，必將有著行為發生學意義上的普遍指導價值。

關鍵詞：伊闕峽谷 龍門石窟 交通環境 文化群落 信仰意識 行為發生學

一、龍門石窟的自然地理概況

龍門石窟所在的伊闕，是黃河支流伊水切斷秦嶺餘脈伏牛山北翼形成的一段天然的峽谷。《水經注》曰：「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註 1]伊闕位於洛陽市南郊十三公里的龍門山北陲，其地理坐標當東經一一二度二十七分五十四秒，北緯三十四度三十三分二十四秒。伊闕峽谷主體通道呈北緯十度E的南北走向，其南北長約一二〇〇米，東西寬約一五〇—二五〇米，東山主峰海拔

三七一·八米，西山主峰海拔三〇七·六米，峽谷平均深度約一二〇米，伊水兩岸有分別高於河床十五—二十和四十一—五十米的二級階地。伊闕峽谷的岩石系統，為寒武紀——奧陶紀的石灰岩構造。其斷崖底層的水蝕台地，被歷代人民開闢為瀕臨河岸的交通孔道。自古迄今的南來北往者，就以這溝通了黃河流域和江漢流域的交通要衝為依託，在龍門一帶演出了一幕幕令人訴說不盡的人文故事。

二、伊闕內外的早期歷史事跡

自大禹疏浚伊闕水道之肇始，作為秦嶺東段一處具有戰略意義的通衢地帶，伊水沿線曾經發生了一系列與環境地理有關的歷史事件。且看《水經注》「伊水」條的連篇記載：

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蔓渠山。……又東北過陸渾縣南，……伊水歷崖口，山峽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塢，伊水逕其下，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周書》：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於三塗，北瞻望於有河。」《春秋》：昭公四年（西元前五三八）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魯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故縣氏之也。……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母明視而見白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為水矣。其母化為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而有賢德，殷以為尹，曰伊尹也。……伊水又北逕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故蠻子國也。縣有鄆聚，今名蠻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伊水又北會厭澗水，水出西山，東流逕邠垂亭南。《春秋左傳》：文公十七年（西元前一〇）秋，周甘斂敗戎於邠垂者也。……伊水北逕高都城東，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河南新城縣有高都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東周與鄭高都剝者也。又來儒之水出於半石之山，……其水又西南逕大石嶺南，〈開山圖〉所謂大石山也。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一八九）八月戊辰於山堂立碑，文字淺鄙，殆不可尋。魏文帝獵於此山，虎超乘輿，孫禮拔劍投虎於是山。……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王隱《晉書》曰：「惠帝使校尉陳總、仲元詣洛陽山請雨，總盡除小祀，惟存大石而祈之，七日大雨。」即是山也。……伊水逕前亭西，《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西元前五二〇）：晉箕遺、樂微、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者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為泉，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西元前五一六），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鑄石開軒，高薨架峰，

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於伊水。傅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二二四）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以下。」蓋記水之漲減也。右壁又有石銘云：「元康五年（二九五）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褒，斬岸開石，平通伊闕。」石文尚存也。[註 2]

周秦伊闕一帶的歷史故實，《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西元前五一六）亦有「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的記事。《通鑑》卷四則記載了戰國時代秦與韓、魏聯軍在伊闕的一次著名戰役：赦王二十二年（西元前二九三），韓公孫喜、魏人伐秦，秦將白起「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

伊闕地區古代史上的上述事例，表明當地在地緣政治學方面有著重大的戰略價值。周秦魏晉政治社會對這一地區的關注，反映著歷代統治階級對伊闕在黃河流域和江漢流域之間所具交通孔道地位的認識。

三、龍門石窟與北魏軍事交通的聯繫



圖一 北海王元詳造像記

北魏於太和十七年（四九三）「經始洛京[註 3]」，此後即伊闕峽谷為通塹，加緊了對南朝邊疆的軍事行動。龍門石窟古陽洞北壁有造像題記文云：「維太和之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皇帝親御六旌，南伐蕭逆。軍國二容，別於洛汭，行留兩音，分於闕外。太妃以聖善之規，戒途戎旅；弟子以資孝之心，戈言奉淚。其日太妃還家，伊川立願：母子平安，造彌勒像一區，以置於此。至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法容剋就，因即造齋，鑄石表心，奉申前志。永願母子長餐化年，眷屬內外，終始榮期，一切群生，咸同其福。維太和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元詳造。」（圖一）

古陽洞題記中所言的這次北魏南伐，檢之史乘亦有相應的記載。《魏書》卷七〈高祖紀〉：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十有二月辛丑朔，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辛亥，車駕南伐。」

歷史文獻關於此次南伐的干支紀日，與元詳造像記的敘事日期完全吻合，由此可以看出龍門碑刻資料在歷史紀事方面有著珍貴的信息價值。又由元詳題記內容，我們可以得知當時

的北魏軍旅是於洛水之濱誓師之後經由伊闕向南進發的。當此之際，包括北海王國太妃高氏在內的貴族階層，曾隨軍南行而與魏孝文帝在伊闕關外行留分別。太和二十二年（四九八）元詳之在古陽洞造此彌勒像龕，是爲了其母高氏當年「伊川立願，母子平安」而做的功德。北魏佛教信仰與戰爭危且之結緣，元詳造像題記可謂一例情感摯著，音容逼真的寫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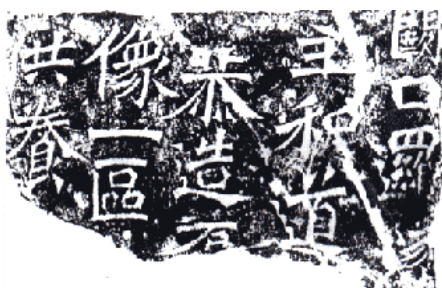
伊闕峽谷在南北朝政治關係中的重要地位，古陽洞同壁楊大眼造像記之內容亦可得到相應的證明。楊氏造像題記有云：「邑主仇池楊大眼爲孝文皇帝造像記，夫靈光弗曜，大千懷永夜之悲；□縱不邁，葉生含靡道之懺。是以……輔國將軍、直閣將軍、〔游擊將軍〕、梁州大中正、安戎縣開國子仇池楊大眼誕承龍曜之資，遠踵應符之胤，稟英奇於弱年，挺超群於始冠。其□也，垂仁聲於未聞；揮光也，摧百萬於一掌。震英勇則九宇咸駭，存侍納則朝野必附。靖玉衢於三紛，掃雲鯨於天路。南穢既澄，震旅歸闕，軍次□行，路逕石窟，覽先皇之明蹤，賭盛聖之麗迹，矚目徹霄，泫然流感，遂爲孝文皇帝造石像一區……。」（圖二）



圖二 楊大眼造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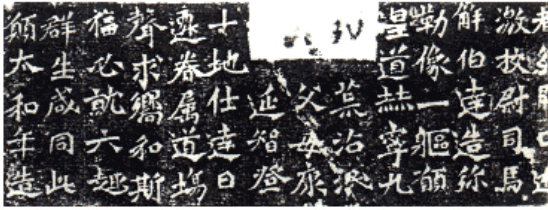
楊大眼是北魏遷都前後開拓南疆過程中「勇冠六軍」、「見稱當世」的驍將。楊氏造像記中「南穢既澄，震旅歸闕」之記述，指的是景明元年（五〇〇）蕭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楊大眼與奚康生等率眾赴援的南伐之役。這次戰後，楊大眼「以功封安成（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註 4]。此次凱旋中，當其「軍次□行，路逕石窟」之際，在古陽洞看到宣武帝爲孝文帝發願鑄造的當窟本尊，於是「矚目徹霄，泫然流感，遂爲孝文皇帝造石窟一區，凡及眾行，罔不備列，刊石記功，示之云爾」。龍門石窟與北魏軍事交通關係之密切，楊大眼造像史迹又見一斑矣。

伊闕峽谷除了作爲北魏與南朝軍事對壘的交通孔道外，在中原王朝遏制南方蠻族侵擾河洛流域的戰略防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載：「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漫，布於數州。……至晉之末，稍以繁昌，漸爲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類，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爲丘墟矣。……自汝水以南，處處鈔劫，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註 5]爲了阻止蠻人的北侵，北魏在伊闕這一交通要道上設立了專門的軍鎮機構——關口關。



圖三 和道恭造像記

今古陽洞北壁有太和晚期的造像題記文云：「關口邏隊主和道恭造石像一區供養。」（圖三）這是當時伊闕具有軍事巡守價值的證明。此外，該窟同壁另有關口關信士



圖四 都綰關口游激校尉司馬解伯達造像記



圖五 關口關功曹敦光造像記



圖六 關口關功曹史張英周妻蘇文好造像記

題銘數品，其中碑文清晰可舉者如：「都綰關口游激校尉司馬解伯達造彌勒像一軀，願皇道赫寧，九荒沾泯，父母康延，智登十地，仕達日遷……太和年造」（圖四）；「正始五年四月二日，關口關功曹生父母、因緣眷屬，常與善居，所願從心」（圖五）；「正始五年四月二十日，關口關功曹史張英周妻蘇文好造石像一區，為所生父母、合門大小，常與善居，願願從心」（圖六）。

龍門石窟古陽洞造像遺跡中有關「關口關」的碑刻內容，還為我們辨析歷史文獻關於蠻人與北魏王朝的地緣關係提供了文物依據。

《北史》卷六十六〈李延孫傳〉，記延孫「伊川人也。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掠關南。魏孝昌中，朝議恐其為亂，乃以長壽為防蠻都督，給其鼓節。長壽盡其智力，防遏群蠻，伊川左右，寇盜為之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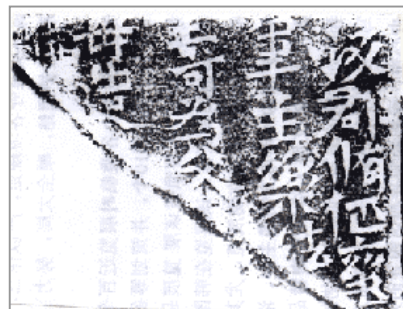
同書同卷〈韋祐傳〉：「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事母以孝聞，慕李長壽之為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關南。」

同卷〈魏玄傳〉：「魏玄，字僧智，其先任城人也，後徙於新安。……玄每率鄉兵抗拒東魏，芒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為東魏守，而玄母及弟並在宜陽。玄以為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

《北史》三傳關於伊川、宜陽毘鄰「關南」的記載，《周書》卷四十三，李、韋等傳俱稱「關南」為「關南」。而《周書·魏玄傳》且有「及魏孝武西遷，……即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的記事。

又《魏書》卷四十四〈費穆傳〉，有李洪於陽城起兵反魏，穆往鎮壓而「破於關口之南」的記載。

對於同一地名爲三史所歧載，《北史》校者乃以《魏書·地形志》洛州陽城郡有「陽城關」的記事，遂有將「關南」斷爲陽城關之南並疑《周書》爲是的校勘[註 6]。今由龍門古陽洞「關口關」曹史之題記，可以明瞭《北史》、《周書》有關「關南」、「關南」之記事，均爲「關口關」省略之時稱。而兩史記事之背景，皆已透露出「關口關」之設立，與北魏阻遏南蠻北侵有著密切的關係。古陽洞北壁北魏造像中另有「汲郡禳征蠻軍主樂法壽爲父母造佛」（圖七）的題記，可見樂法壽正以征蠻軍務爲起因，始從汲郡往還於伊闕。



圖七 征蠻軍主樂法壽造像記

北魏時代伊闕峽谷中的交通史事，龍門石窟北魏晚期的造像遺跡中亦有零星的顯示，這大約反映了北魏晚期國運衰微，無暇南顧的情勢。

龍門西山老龍窩中層，有一雕飾華美的廡殿形佛龕，龕側造像題識文云：「魏故使持節平南將軍原陽侯都太守青州刺史隴西公姚尊□惠銘。公諱尊，字天生，南安人也。秦文桓惠王之曾孫，鎮西將軍隴西惠公之世子。……至乃方軌南陸，涇塗伊川，觀崇崖之崢嶸，臨清流之漫衍，遂鑄岩靈石，雕神妙軌。……正光□年……朔十五日造。」

考該龕像主隴西公姚尊，乃北魏外戚南安羌酋姚黃眉之裔緒[註 7]。今由姚氏題刻「方軌南陸，涇塗伊川，觀崇崖之崢嶸，臨清流之漫衍」之遺詞，可見直至正光年間（五二〇—五二五）伊闕在北魏京都地區的南北交通中依然占有一定的地位。

北魏末葉與「關口關」有內在聯繫的文物資料，龍門石窟洞窟調查中並有相應的發現。如藥方洞南壁有造像題記文云：「……大中大夫平南將軍南面大都督清水縣開國公李長壽妻陳暈，宿因莫遇，嫡爲李室，敬善內敷，志存超悟，割捨家財，造釋迦像一堪。願夫主高遷，帝王寵念，……永安三年六月十三日」（圖八）。

藥方洞石刻中所見之李長壽，正是前文所引那位北魏防範蠻人北侵洛京的伊川土豪。其嫡妻陳暈在龍門爲「夫主高遷，帝王寵念」而造像，反映了李長壽在關口關一帶享有相當的政治影響。



圖八 李長壽妻陳暈造像記

這正好透露出伊闕峽谷在北魏末葉的國家政治中仍舊具有戰略防禦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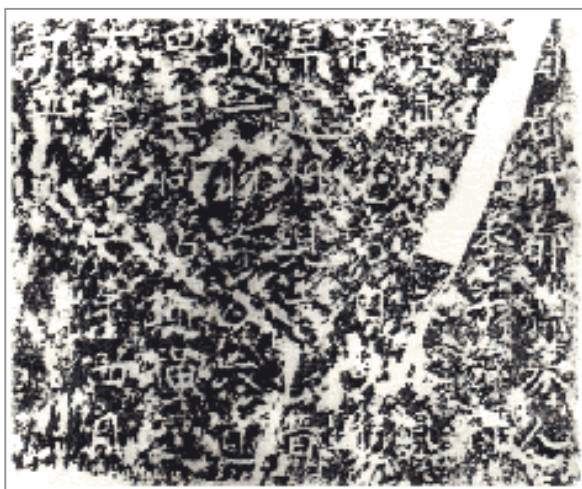
四、龍門石窟與隋唐伊闕之交通

隋唐時代，由於中國處於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中原地區與四荒八服的交通往來在空間領域中已有極大的拓展，這從龍門石窟當時的造像銘記中亦可找出諸多的例證。

今龍門賓陽中洞窟口北側有造像題記文云：「蜀郡成都縣募人□□□李子贊行至此，敬為亡父，見在母、兄弟、自身願早還相見，造觀音像一軀，并及六道四生，同沾斯福。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圖九）

李子贊在龍門為早還故鄉，邀報平安而發願造像，其應募北上之本事應為去歲煬帝雁門之遇圍。《隋書》卷四〈煬帝記〉，載大業十一年（六一五）「八月乙丑，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雁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於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李子贊應募返蜀路經於伊闕，說明隋唐之際伊闕峽谷仍為中原南遷江漢的通衢。

隋唐間洛陽溝通巴蜀的情狀，龍門有初唐時期的造像題記可以作為一個突出的例證。今龍門老龍洞北壁有造像題記兩則文云：「永徽四年八月十日，涪州司馬息郭愛同為亡母敬造阿彌陀像一龕，願亡母得生淨土，見存父及妹等願平安，無諸災障。」「永徽四年十月八日，涪州司馬息郭愛同為亡婆敬造觀音菩薩一軀供養」（圖十）。郭愛同以涪州裔息歷臻於伊闕，足以說明自巴蜀赴覲於東都，伊闕無疑是一個傳統的通途。



圖九 蜀郡成都縣募人李子贊造像記



圖十 涪州司馬息郭愛同造像記

圖十一 汝州郟城縣武上希造像記



有唐一代自中原途經龍門與江漢、嶺南往來交通的情況，龍門石窟的造像題記中尚有不少的信息，今縷列若干，以示梗概。我們先從東都毗鄰地區的交通資料談起。

龍門敬善寺北崖有顯慶四年（六五九）造像記文云：「汝州郟城縣武上希敬造彌勒像一鋪，為己身並亡妻高氏及兒女等合家平安，及法界皆同此福。顯慶四年四月十五日訖。」（圖十一）潛溪寺南側有題記又云：「洛州嵩陽縣尉李守德，去乾封年中於此過，發心敬造石像一龕。比來不遂本意，今垂拱二年三月十三日於此寺過，適逢九雨，為造大龕，奉為七代師僧父母及家口平安□（歸）還□（洛）□（京），並願法界有情俱離苦河，齊登佛果。垂拱二年四月三十日。」老龍窩北崖有題文曰：「河南府陸渾縣弟子程奉一供養，開元九年。」

圖十二 衛州共城縣人蘇鎬父造像



郟城、嵩陽、陸渾三縣，地在東都洛陽的附近。由於地緣距離的密邇，如李守德等輩則可以歷年數次往還於伊闕。

有唐一代中原與漢水流域交通往來的信息，龍門造像題記所見者有如：賓陽南洞東壁題記文云：「襄州襄陽縣尉裴敬同敬造觀世音菩薩一軀，大唐貞觀□年。」雙窯南側有題記文云：「大唐永淳元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十一日，衛州共城縣人蘇鎬父任唐州比陽令，言將覲省漢也。背河朔而行，途經龍門，而極目翠岩千仞，尊儀萬龕，睹淨域以歸心，仰靈相而誠懇，遂發第一願，敬造釋迦牟尼像一龕……二年九月八日造成。」（圖十二）老龍門洞北壁題記有云：「天授二年十月，襄州谷城人田仁方為一切苦厄敬造觀音像一軀。」

至於湘嶺郊外與東都洛陽的交通聯繫，由於地途遙遠，關山重疊，往返非易，鄉思難續，龍門石刻中的相關資料竟讓人讀來氣蕩腸迴、意碎容動。今龍門西山清明寺北壁有高宗、武后時期題記文：「劉天庶為流端州，散造救苦觀音菩薩一軀，兗州金鄉縣令願得平安早日還。」又普泰洞窟口南壁造像題記文云：「佛者，弟子通事舍人韋瓊之所造也。弟子以大周長壽□年自五嶺□省途過於此，於時洛城門□，越嶺徼駐征驂於淨土，□□□□□□□□歸心寶□，願記三乘之□，早詞五嶺之歸，……遂造□成，用申弟子之情……。」東山萬佛溝北崖，有造觀音菩薩題記文云：「救苦觀世音石像銘并序 □□自建中□年，自御史謫居夜郎。貞元二祀，自□官貶□（嶺）南，□皆為權臣所忌。……亦不知其所如往也。夜宿龍門香山寺靈龕，天眼億萬，相對稽首。悲嘿，如暫降臨，因發誠願：『歸旋之日，於此造等身像一軀。』此乃夜郎之役也。貞元之黜，又過於此。仆夫在後，獨行山側，有白衣路人隨馬先後，因唱言曰：『去日開花，來時果熟。其去也春三月，貶信州長史；其歸也秋八月，遷右司郎中。』

詳求所言，有如昭報。復以闔門幼弱，萬里沿岸，畏途炎裔，鮮克保全。勝衣含氣，我獨無害，即知慈雄覆護，匪無顯效。心形祈惕，焉敢暫忘。……貞元七年歲次辛未二月八日……。」（圖十三）敬善寺北崖又有造像記曰：「交州都督府戶曹韋剋諧及妻皇甫造。」（圖十四）



圖十三 盧征造像記

以上四則造像題記中的韋瓊，盧征兩位像主，乃《唐書》中見有記載的人物。他們以仕途沉浮宦游於嶺南、夜郎之邊荒，故必於留連伊闕之際萌發出祈求佛祐，邀報平安的心聲。這種離別鄉關、憂讒畏譏的傷感情緒，無疑透露出有唐一代嶺外交通的艱辛。

大約伊闕在隋唐時代的南北交通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以致天授年間（六九〇—六九二）武周王朝復於龍門一帶設置了控制行旅的關戍。《唐會要》「天授二年七月九日敕其雍州已西安置，潼關即宜廢省，洛州南北各置關」[註 8]的記事，《舊唐書·許王素節傳》「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刺史。天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行至都城南龍門驛被縊死」[註 9]的敘述可以作一補充之例證。這兩條史料反映出龍門關驛在節制隋唐時代的南北交通中發揮著一定的政治作用。



圖十四 交州都督府戶曹韋剋諧及妻皇甫造像記

有唐一代東都經由龍門往來江漢流域的通道，近年洛陽出土文物亦有相關信息可資驗證。伊闕西山南麓出土張二十二娘墓誌有云：「張氏女者，南陽白水人也。裔祖衡，漢河間王相。……父景尚，前任房州刺史。……緣父被誣，謫拜忠部。隨官三峽，總夫二載。鬱鬱冥疾，以開元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夭逝於忠別駕官舍，春秋二十二。以二十一年歲次癸酉五月景寅朔七日壬寅，窆於龍門山南官路西南四里鞏家山原上。」[註 10]這條由伊闕南出江漢的「官路」，延至中晚唐時代依然聲影絡繹、不乏行人，白居易題龍門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所謂「危亭絕頂四無鄰，見盡三千世界春，……回看官路三條線，卻望都城一片塵」[註 11]者，正是晚唐文人墨客對伊闕官路與東都人事風塵的抒情描寫。

龍門石窟唐代造像題記中，另有一些涉及當時重大交通史事的資料，這為研究中古一代的社會往來提供了一些帶有實證意義的文化信息。如西山唐字洞南壁題記有云：「永徽二年七月六日，永州湘源縣人郭孝隱男大亮入遼，為造觀音一軀，願行人平安。」敬善寺北崖同期造像題記中又有「僧知道為入遼兄造地藏菩薩」、「張行忠為東行造」菩薩一軀的內容。

考郭孝隱、張行忠題記中「入遼」、「東行」之祈福，實際正是貞觀晚季李唐征遼事件的續筆。檢之唐史，知貞觀十八年（六四四）有唐廷命李勣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張亮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從陸海兩路東征高麗的本紀。翌年四月至九月，東征戰事以來獲全捷而班師。當時朝廷即有「發天下甲士，召募十萬，並趣平壤」[註 12]的頒勅。今由龍門郭孝隱等輩的題記，可見迨至永徽初年征遼戰士尚有滯留異鄉者。

李唐王朝與三韓地區的政治交往，龍門石窟高宗中期的造像題記仍有不斷地涉及。如西山老龍洞南壁題記中有：「清信女王三娘為亡父母及見存眷屬、姐妹兄弟，又夫主張通東行，願平安敬造阿彌陀佛像一龕，法界蒼生，共同斯福，大唐總章元年十一月一日。」清明寺窟門北側題記則有：「不可思宜（議）清信王婆，為兒宋玄慶東行，願得平安敬造觀音一軀了。上元三年二月。」

與這兩則造像題識相關的歷史背景，文獻中則有乾封元年（六六六）「高麗莫離支蓋蘇文死，其子男生繼其父位，為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獻誠詣闕請降，詔左驍衛大將軍契必何力率兵以接應之」；其「冬十月己酉，命司空、英國公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註 13]的記載。洎總章元年（六六八）九月，李勣破高麗、拔平壤，乃「以其地為安東都護府，分置四十二州」。又咸亨五年（六七四）二月，遣「劉仁軌為雞林道大總管以討新羅」，至上元二年（六七五）二月，「雞林道行軍大總管大破新羅之眾於七重城」[註 14]。

龍門碑刻所刊張通、宋玄慶東行之遺蹤，其所參與的交通行為必是上述高麗、新羅之役的軍戎。與龍門碑刻記事相逢仍，洛陽地區其他的碑刻遺跡中亦有為上述東征行人邀報平安的發願。今鞏縣石窟第二窟西壁之下隅，有當年所鑄之造像題記文云：「大唐乾封二年八月十日，比丘僧法秤敬造阿彌陀像一龕，上為皇帝、師僧父母、東征行人，並願平安。又願國土安寧，十方施主離障解脫、成無上道。」由此不難看出，此類頻仍發生的東征，在中原人民的思想中已烙下震慄心髓的印象。

唐代中原與西北各地的交通，龍門石窟造像題記中歷有繁複的記敘。如賓陽南洞北壁題記有云：「清信女蕭為亡兒孝子敬造阿彌陀佛一軀並二菩薩，願當來往生無量壽國，……然亡兒未捨壽以前，願亡後即於龍門石龕內。母子情深，不違本志，即以貞觀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從京□（城）就此寺東山石龕內安置訖。」龍花寺前庭北壁題記則有「弟子張四娘為翁婆入京及家口平安造藥師、彌陀各一區，及為亡人孟智基造阿彌陀像一區」的發願。這是兩京之間密邇往來的例證。

另如賓陽南洞北壁造像記有云：「永徽三年四月，高昌張□、康思□等為亡父母及合家內外眷屬敬造像一龕。」而張安洞東壁門拱北側又有「總章二年二月十日，高昌張安為亡父敬造」阿彌陀佛一龕的題記。這是東都與西州之間因貞觀十四年（六四〇）高昌內屬而發生上層人士絡繹往來的例子。

次如東山看經寺上方，有北印度來華僧人造像題記文云：「……今有北天竺三藏弟子寶隆，上奉諸佛、中報四恩、下及□□敬造釋迦牟尼一鋪。……景雲元年玖月一日吐火羅僧寶隆造。」這是洛陽與西域古代交通往來絕好的史例。這些年代不等、地域各異的交通資料，充分反映出洛陽在當時的中西社會交往中享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中古時代的末葉，龍門佛教造像活動趨於衰微。此間見之於碑刻題記中的交通史料，已遠不如隋唐時期之豐仍。今以宋代碑刻題識為片例，對此間龍門交通史事作一大致的檢閱。

龍門西山魏字洞北側，有咸平三年（一〇〇〇）摩崖石道記碑刻一通，其碑文有云：「……石道記左街廣愛寺崇達奉……撰，翰林待詔……秘書丞□正賜緋魚袋吳文賞書。……師本洛陽人，俗姓高氏。……才修梓匠，措意禹門，願石道以陳殘，起□征而整葺。矧自太平興國癸未歲季五月，伊水……坦路崩陷，巨石欹傾，逾月以來，杜絕往復。……自雍熙四年丁亥歲二月，……飲□者差肩而至，荷畚插者陳力而往。端拱已來，首尾三載，厥功已就，大路坦途，遍會禹門。……今通惠大師……施一勞永逸之勤。時大宋咸平三年□月二十□日矣。」此外，龍門藥方洞、萬佛洞、奉先寺及東山萬佛溝南崖，有天聖四年（一〇二六）三月丁裕修石道題刻多處，其奉先寺題刻文云：「西京龍門山大像龕題名，三班借職監，伊河竹木務兼本鎮煙火修整石佛石道公事丁裕，與弟祐並仲子觀、東鄉友貢史顏翰、安定胡汎同至此。大宋天聖四年丙寅三月二十六日。裕書，鑄字李遇。」另在老龍洞洞口之南壁，有宋人修石道題記又云：「甲子歲元豐七月三十日修石道記，造人黨□□。」

龍門石窟以上三則宋代石刻，反映出北宋時期公私各界對伊闕水陸交通的重視和投入。這些帶有工程意義的文物資料，與前述魏唐期間富有敘事價值的造像題記，無一不為我們研究中古時期與龍門石窟結有因緣的交通往事展示出極其珍貴的學術信息。

五、龍門交通史料與中古佛教信仰之關聯

考漢唐以來的中國歷史文獻中，涉及民政引曳、交通往還的記事資料可謂瓊珠盈篋、汗牛充棟矣。對史乘中這些俯拾皆是的常規資料，學界已有良多取材顯諸於各自的研究領域中。然據近代學術史跡之回顧，我們感到這些史學研究大多偏重於利用此等材料對古代社會客觀世界的探討，這無疑反映出傳統史學在取材範疇和理論趨向上存在著機械唯物史論的局限性。

還在二十世紀的初葉，以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一八五六—一九三九）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學派即對人類意識形態的社會性功能給予了深入的研究。弗洛伊德之注重人類意識活動的價值及其人類心理層位的動態性分析，為我們研究古代社會生活現象的主觀成因提出了值得正視的認識命題。

古代的中國社會，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跨地域的交通阻斷曾嚴重地制約著人們物質交流和情感往來的正常進行。當人們為生活所迫不得不付諸於交通實踐的時候，以蔑視人權為政治基礎且享有地域統治權力的封建國家則從來不曾為社會各界提供承擔風險的安全保障系統。封建國家這種帶有強烈東方色彩的民政機制，導致了當時參與羈旅行止的流動群體充滿了生命危機的思想感受。

龍門石窟自公元五世紀末葉產生佛教造像之日起，數以千計的發願題記中包含了為數眾多的與古代交通史事息息相關的文物資料，這無疑為我們研究中古時期交通往事在人們心目中留下的思想印記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本文上述洞窟資料之徵引，總體上反映了魏唐時代中原與外地之間以交通環境為背景而發生的一些洋溢著時代氣息的人文情節。通過對以上造像題記的歸納與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類考古資料包蘊著一個十分突出的題旨性特徵——此即各品造像題記之主人公，當其面臨某次交通運行的時刻，便無一不對這種旅途生涯表達出祈求平安的心聲。

與這種心理動態互為表裡，上述祈求旅途平安的人們，在表達這種精神追求的過程中，其個體行為竟全部採用了鑄刻造像的方式。由於這一社會群體的主題意識俱在於祈求旅途的平安，以致他們的造像題材幾乎全部選擇了「應聲隨求」、「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龍門石窟下述造像題記，可為這一描述提供可靠的論證：「永平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造觀世音一區，上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因緣眷屬，願弟子願願從心，所向無難。清信女宋溫鴛」（古陽洞北壁）；「李君瓚修紫桂宮□□平安至家，敬造觀音菩薩，調露二年六月三十日」（北市絲行像龕北崖）；「弟子杜十四娘為身患得恙，造救苦觀世音菩薩一軀，願合家平安，咸同斯福，一心供養。開元三年三月十六日」（萬佛洞南崖）；「弟子劉俊為父母，願身平安，造救苦菩薩一區」（清明寺西壁）；「魏州莘縣人任右藏丞，願合家眷屬平安，敬造觀音一區」（萬佛洞南崖）。

當我們將這一文化現象設置於行為發生學視野下進行考察的時候，我們顯然可以發現，正是古代社會生活系統中安全保障機制的匱缺，導致了人們對自身安全、家道平安產生了種種處心積慮的憂患。而由於佛教教義中廣泛宣傳著佛陀、菩薩保祐平安的信條，於是渴望旅途平安的行人社會遂以「罄竭丹誠」的信仰實踐，雕造了一軀軀體現平安保障的觀世音形像。龍門石窟古代遺跡中這種數量繁多、特徵鮮明的文化群落，形成了伊闕峽谷魏唐時代一種獨具特色的人文景觀。中國佛教石窟寺藝術之弘盛，中古交通史上以功德造像祈求佛法護祐顯然是一個重要的成因。[註 15]

由此看來，龍門石窟與中古交通史事相關聯的一切佛教造型藝術，作為一種東方歷史文化現象，無疑證明了宗教信仰及其藝術實踐是一定的意識形態在某種特定歷史條件下，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心靈補償和美育創造。我們認為，世界文化史上種種儀像萬般的宗教藝術，大抵與此有著相同的成因緣由。

【註釋】

[註 1] 《水經注》卷十五「伊水」條。

[註 2] 同 [註 1]。

[註 3] 《魏書》卷七〈高祖紀〉。

[註 4] 《魏書》卷七十三〈楊大眼傳〉。

[註 5] 《魏書》卷一〇一〈蠻傳〉。

[註 6] 《北史》(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校勘本)第八冊,第二三四一頁,注〔九〕。

[註 7] 參見張乃翥,〈從龍門石窟造像遺跡看北魏民族關係中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第三十二—四十頁。

[註 8] 《唐會要》卷八十六。

[註 9] 《舊唐書》卷八十六〈許王素節傳〉。

[註 10] 墓誌拓本影印件,見張乃翥「龍門續志續跋三題」(待刊稿)。

[註 11] 《白氏長慶集》卷三十四,〈春日題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

[註 12] 同 [註 9],卷三〈太宗紀〉。

[註 13] 同 [註 9],卷五〈高宗紀〉。

[註 14] 同 [註 11]。

[註 15] 參見張乃翥,「龍門石窟歷史成因之探索」(待刊)。